

编者的话

泰顺县地处浙闽边区，洞宫山脉绵亘全境，南雁荡山屏障东南；飞云江，交溪，沙垵三条水系在境内依山奔流。是一个“青山春常在，绿水好长流，”的大山区。

我党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在这里建立南方八省十四块游击根据地之一——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基地。

一九三〇年泰顺人民深受地主、官僚压迫剥削和灾荒之害，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民迫切要求革命。我县泗溪区泗溪乡白粉墙村木偶艺人曾关元顺乎民心，揭竿而起聚众起义，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坚持不久，不幸失败。

从一九三一年四月起闽东特委多次派人到我县，发展组织，开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建立了寿泰中心县委。在我县的党组织有泰顺中心区委，泰东区委，泰南区委。发动群众，开展五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革命火炬红遍全县。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与闽东特委会合后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我县流动往返，直接领导泰顺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四月，挺进师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留下少数骨干在浙江临时省委、浙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对白区党的“精干隐蔽”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我县人民在浙南特委、浙闽边区中心县委领导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解放泰顺全境。

泰顺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坚持十九年极其艰苦的曲折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是我党革命斗争史的一页。

为了把我们党光辉战斗的历程记述下来，把我们党无比丰富的经验总结起来，把我们党优良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的事业服务，党中央决定编写和出版党史正本，动员全党动手广泛征集党史资料。陈云同志要求我们为了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忠于历史才能忠于真理。”

中共泰顺县委十分重视这一工作，成立了中共泰顺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和办公室，专门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当年直接参加泰顺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满腔热情的帮助，我们征集到一批资料，为了互相交流情况，多方征询意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为编写党史服务。为此，我们编辑印发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泰顺党史资料通讯》分发有关部门和老同志参阅。

我们虽然热爱这项工作，但由于理论、政治和文化水平有限，加上反复考证不够，缺点，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当年参加泰顺革命斗争的各位革命前辈，广大干部和群众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并积极为本刊撰写革命回忆录和提供历史资料、文物，让我们一起为编写好党史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泰顺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1982.4.7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泰顺党史资料通讯

第一期

中共泰顺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刘英同志的诗..... (1)

李家山上两株“合抱枫” (1)

王陶生同志介绍闽东革命斗争情况

..... 中共福安地委党史资料办公室整理 (2)

山洞中的红军医院..... 黄明星口述.....王简军整理 (8)

泰顺县党史重大事件第一批专题资料征集规划..... (21)

中共泰顺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和办公室组织..... (23)

泰
順
縣

刘英同志的诗

生矣为英，死矣为灵；

念我烈士，万古为名。

——悼念烈士王烈怡同志而作

※ ※ ※ ※ ※ ※

离乡拾爱赴疆场，七载征尘撼华帮；

偷生弹雨息囹圄，壮志不屈实堪扬。

——为郑丹甫同志出狱而作

※ ※ ※ ※ ※ ※

四世同堂，极尽天伦之乐；

年屈古稀，爱国犹不落后。

——为郑志西老人七十大寿而作

李家山上两株“合抱枫”（1）

山重重、叠叠峰，

李家山上挺立两株“合抱枫”，

愤地主，租税重，

千心万眼盼红军。

合抱枫，年年红，

千年生根摇不动。

穷人穷，力量雄，

红军带领万人众。

万人众，红军红，

李家山下灭“国军”

合抱枫，年年红，

火烧山头遍地红。

注（1）李家山是丁泰区所辖，闽浙边省委在这里召开过李家山会议，红军也在这里打过胜仗，李家山是我党游击根据地，山上有两株合抱枫。现属福鼎县

这首歌谣刊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浙江歌谣”

王陶生同志介绍闽东革命斗争情况

(一)初期活动在泰顺

1931年4月24日我在福安长冠客店找到马立峰同志。参加了革命。他叫我到浙江泰顺去发展组织。那时我在泰顺北坑烧炭卖，这里有三十多个炭窑和一个炼铁炉，参加烧炭、洗铁砂、炼铁的有二百四十多人，经过七天的秘密宣传，成立了一个贫农小组，交待了他们继续发展组织的任务后，我就回官洋向马立峰同志汇报工作，并参加了在福安溪口山上石塔里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七天，参加的有马立峰等15人，成立了闽东特委，计有常委七人：马立峰、占如柏、阮英平、施霖、我、还有郑宗玉等八个执委。会议提出工作：发动群众，抗租抗债，秘密发展贫农组织。分工：马立峰去福寿地区、占如柏去安德地区、阮英平去霞鼎地区、郑宗玉去福霞地区、我去泰顺地区活动。

会后，根据交通的报告，占如柏指挥我们和福安贫农团七十多人。化装搭船到三都，三都桥抢来伪海军陆战队哨兵的十七支步枪，合并马立峰的一把驳壳和阮英平的一支曲九，我们共有十九支枪，回到福安成立一支游击队三十多人，由占如柏带领在五县活动。

这以后，我又回泰顺，以挑铁砂职业为掩护，在泰顺葛洋、上洋等21个村和离泰顺城5里的川山洋等地方，成立起贫农小组，提出抗租抗债的口号，发动群众拖租赖债。

(二)寿宁1933年的斗争

大约在1931年时，范铁民同志就在寿宁一区秘密开展工作，以后逐步发展到我的家乡渔溪、花岭一带。因而，到1932年尾，马立峰调我回寿宁，配合工作。

斗争的头可真难起。想来想去，我们决定先打粮柜。在1933年1月。由范铁民打了伏际的2个粮柜；2月，又打了潘洋的两个粮柜，于是，粮柜又集中到屏溪去了。3月2日，范义生、范铁民和我等十多人，又赶到了屏溪桥头，打了七个粮柜，没收款83元，我们又再凑25元，买了寿宁第一支曲九枪。

3月尾，范铁民在南山顶召开贫农小组长会议，二百多个组长汇报当时断炊的农民有一千多户，有的连春耕的种子也没有，为此就决定开展分粮斗争。于3月27日，集中大安、伏际等地贫农第一次分掉水寨洋头地主的170多担谷子当种子。不久，各地更加普遍地开展分粮斗争，先后分了下洋边、庄下、浩溪头、潘阳、官洋等处地主的谷子1200多担。

分粮斗争影响很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在南山顶开五天会，参加的有范胥、范义生、范铁民和我等十五人。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林再生（范铁民）。决定下步工作是：村村组织贫农团，成立村革命委员会，开辟交通线；开展抓土豪做财政（要能筹款二百元以上者）和分粮斗争（对做民团头的、财主的放高利贷的人的谷全部分掉，团结

够吃够用户，绝对保护他们，错分的要退还）；立即组织红带队，召集各地打铁匠来打梭标，请里路的大安、伏际的“法师”来设坛“教法”。这是五月。

六月，仙峰阳头里成立寿宁县党部，由范义生负责，并在下南区的石鼓成立区党部，由阿弟负责。县党部就各地红带队（赤卫队）集中到阳头里一带，统一指挥打击敌人。

这期间，从福州来的伪教导团一团、保安团两连和从泰顺来的伪84师两连，天天和我们接触，打了猪母洋、南阳、镇家岭等20多次大小的仗。在猪母洋战斗中，因为红带队的纪律规定“什么东西都不能要”，队员们就连敌人丢的枪也不拾，结果敌人爬上屋顶开枪，我们反而伤亡数十人。

群众在斗争中是很顽强勇敢的。当队伍和白匪作战时，妇女们就煮饭造粥。送茶送饭支援队伍；当白匪退后，又立即布置步哨投入生产，精耕细作，争取好收成。他们家里都备有木棍、竹杆、田刀之类武器，时刻防犯敌人来侵。

很快就过了中秋节，早熟的稻子开始收割。这年的田冬很好，农民很高兴。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又从政和、庆元、泰顺调来84师、教导四团等一千多名匪军，分赤陵洋和渔溪两路包围县党部和革命委员会，企图镇压革命，保护地主抢租。我和林再生等同志研究后，决定在夜晚用“骚扰”的办法。林再生带了黄阿石前往西门坑底和犀溪，我带吴乌弟去城关、南阳、斜滩，我们在一个地点打了几枪，敌人吓慌了，连忙点起火把准备战斗，我们又溜到另一个地点去了。就这样，寿宁城镇弄得满城风雨，敌人疑神疑鬼，整整二十天紧闭城门和栅门，不敢到苏区来，二十天过去了，农民的抢收也快结束了，敌人这才拚命来围。在罗角山我们队伍与敌人打了一仗，消灭了十多人，于是敌人又退回去。

乘这时机，县里布置所有干部深入群众中去，发动男女动手埋藏粮食。教他们怎样挖地洞，怎样使粮食不霉烂的办法。这次发动得很广泛，差不多全县的苏区都是这样做。在这同时，寿宁县党部和革命委员会又召集赤卫队和游击队，在1934年1月4日打进了南阳，组织上立即叫我去组织贫农团，发动群众分粮，但是才住十八天，84师教导团计一个团又六个连的伪兵又来围攻了，我们队伍只好撤出来。

我是掉队到最后在群众的掩护下才撤出来的。回到大垄，碰到叶飞、范式人、范义生、范铁民、赖金标等同志率领二百多名战士正在大垄休整，接到马立峰同志从福安来信说，福安的上坪、下坪、油岭三个民团很坏，调寿宁队伍去歼灭它。这时，寿宁形势很紧张，革命难以立足，我就跟队伍退到福安北区来。二月十日，寿宁队伍在福安官洋集中整编为“红16连”，连长赖金标、政治范式人，我是在连里做宣传工作。全连160人，只有十二支枪，其它人都拿梭标和竹杆。我们一口气，消灭了上坪、下坪、油岭的三个民团，赶到院边与福安队伍六个连汇合，共计一千人在院边过年。当夜，马立峰派人送来18担米糕和679斤猪肉给大家过年，并附一信调走了我，从此，我就离开了“红16连”。

（三）柘荣的土地革命

和我一起调动的还有范义生同志。按照马立峰同志的指示，他带领一部分队伍和我

去开辟柘荣地区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我们路过黄柏，解决土豪问题。当时，福安队伍在柘荣各地误捉四十个农民当土豪。经仔细审查，都是农民，其中四个是富裕中农，我们研究即予全部释放，这件事影响很大。伪柘荣分区区分部孔亮见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政策，很受感动，即派表弟、×良严两人来黄柏请我们去柘荣。

范义生同志和我研究后，决定他带队伍暂扎西垵的×良严家，以防意外。由我一人先往，我来到柘荣城内岭边亭孔亮家一看，孔亮真的弃暗投明了，他即带我到上城、溪坪街、西门、东门各处召开群众会，宣传革命以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这一天，反动分子纷纷逃跑或隐匿起来了，广大群众受到很大鼓舞，要求革命。我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后，二十三日，马立峰、范义生带领红军和赤卫队近千人赶到柘荣，正式宣布柘荣解放。

接着，马立峰同志召开干部会，布置建立政权等工作。会后，先在南门、西门、东门、上城、溪坪里等组织贫农团，成立村政府。与此同时，又在西坑一带捉了33个土豪，做2000多元财政，作为政府和团体的经费。

到三月，福霞上西区苏维埃政府在上城成立，主席林爱，我是付主席，军事袁阿推，财政吴成，文化谢珍。并建立区警卫连，连长袁阿杖，70多人，但只有八支土枪，主要的还是在熊状、西坑、梨坪各路口做石墙，以防大刀会的进攻。

这时，柘荣形势较紧张，浙江兵一排和反动大刀会260人，扎在乍洋企图搞我们，而我们队伍却抓了240多个“鸦片鬼”等待处理，怎么处理呢？大家考虑到形势的紧张和社会的习俗，决定采取游行示众，教育戒烟的办法，从这批“鸦片鬼”中抽出40人严重者戴上长龟帽，其余也戴长帽，拿着吸鸦片用具，于四月十一日在柘荣城游街示众，命令他们边游街边高呼：

“同胞兄弟们，大家都要戒鸦片，听苏维埃政府的话，吸鸦片会使人倾家荡产……”

游了一天街后，又把他们集中到关爷庙统一戒烟，付出60担谷子给他们吃，买了260斤冰糖给他们“过瘾”，15天后，这二百四十名鸦片鬼全部戒了鸦片，莫不身体雄壮精神饱满而回，口口声声感谢苏维埃政府对他们的改造。

这样处理吸毒犯影响很大。通过他们的宣传，就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敌人怕了，驻乍洋的大刀会徒将260多把大刀送来缴了，民团也只好把七支枪送来投降了，一下子形势又好转起来，贫农团、村政府在柘荣农村普遍地建立起来。我们又带领警卫连270多人去攻打泰顺排头的浙江兵，杀敌30多人，缴枪27支。这一战，柘荣周围的环境也安静多了，革命的发展更加迅速。马立峰同志对这几项工作很满意，奖给我挂表和钢笔。

五月，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了霞鼎泰县委，我任书记，付书记是林爱，委员有有庆、吴成等。随后又成立霞鼎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有庆。全县划为四个区：一区在柘荣（即原霞浦上西区），二区在排头（泰顺），三区在梨坪，四区在富溪。

县委成立后，首先领导全县农民进行了分粮斗争。单城关、绸岭、东门、洋边几个地方就分掉2800多担粮食，但是按人口来分，每口只得25斤左右，秋尾过不去，县苏维埃政府又发布告发动富裕户自动献谷互助互救，这也取得一些效果。有个叫林阿住的就自动献谷17担。

分粮之后，按照特委的分田大纲，我们在七月开始全面分田，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

均分配，外逃反动派不分田，地主富农分坏田。从结果看，田地多的地方每口分400多斤，而熊状村最少，每口只有四十斤。只一个月，分田就结束了。我们在城关召开三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分田胜利大会。马立峰、范式人、阮英平、赖金标等同志都赶来参加，指示了下一步工作。晚上又进行了“迎灯”演“红军戏”，人人高兴。

可是到十月下旬，从福鼎来的敌人却一下子占领了柘荣城，我们县游击队只有一百多人，只好分两路从和尚洋、梨坪和上坪、八斗撤退。至此，特委又调我回寿宁工作。

这里叙述一下关于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的情况。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闽东党在柘柱召开了六百多名代表参加的全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很严肃，岗哨很多，每个代表都挂起红绸的代表身份条子才能进出。会上，马立峰同志作了当时形势和工作总结报告。叶飞同志作了闽东红军情况的报告，等等。会议上，选出马立峰同志为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

（四）建立泰顺游击根据地

我从柘荣回到寿宁时，已经是十二月底了。在大安的炭窑头参加了特委扩大会议，共50人，叶飞、范式人，范义生、韦芝祥等都在。会上决定：一、成立寿泰中心县委（书记是我）和松政庆建中心县委（书记是范振辉）。谢作霖为福寿县委书记，韦芝祥为寿宁县委书记，都属寿泰中心县委领导。寿泰中心县委下辖含溪中心区委、泰顺中心区委、泰东区委、泰南区委、官塘区委、地洋地区。寿宁的闽丘区委和奖禄区委划归为松政庆建中心县委领导。二、当时松政庆建是新区，但是形势较好，会议决定由叶飞、范式人、范马富等同志带领红军去配合开辟，展开游击战争。三、为了支援红军，要大力开展筹财政活动。并授命我负责训练工作团，培养地方干部。

会后，我先后在寿宁上地洋、泰顺横岗岭口举办两期工作团训练班，各21天，受训的有江朝林、廖明长、齐国雷等26人。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特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讨论怎样抓土豪筹财政、怎样发展党员、怎样发展群众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等。此后，寿宁岗垵地区才开始建党工作。

我在泰顺建立和健全了泰东、泰南、泰顺中心区等区委，建立寿泰县游击队和泰顺中心区游击队，肃反队，共78人，枪有三十多支，建立了一块游击根据地。这时，我因患白喉病，回岗垵医疗几十天，再去泰顺时碰到刘英同志的队伍在泗溪一带活动。我们在刘英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的指挥下，把游击队分成三、五人的小组，展开游击活动，以牵制敌人，便利农村工作的开展。

这时农村工作是很活跃。我于一九三一年在这些地区发展的贫农团都恢复了起来，提出了抗租抗债的口号，开展筹财政的活动。我们发动群众，叫他们利用亲戚的关系要地主土豪自动献款，这样，我们就不抓他。这办法当时也有效，象泗溪、赤溪、川山洋一带的土豪，在红军威慑下，都纷纷送款来缴。在四月至六月中，我们就筹有六千多块银元上缴闽东独立师。活动在松政庆建一带的叶飞同志，每隔一、二十天就来给我指示工作，并带走筹集的财政给师部开支。

大约到五月后，国民党派兵从七姑、洪口、交洋三路向我根据地“围剿”。每天烧山20里，企图消灭我们。我们立即转入反“围剿”的斗争。主要办法有二：一个是发动群众去告伪兵，另一个是挖桥掘路，进行反击，我们在蒋层召开工作团会议，来贯彻这两个措施。

由于我们根据地都是山乡，群众依靠竹木为生。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去告伪兵的理由是：柴竹要三四十年才有出息，现在全部烧了，叫老百姓吃什么呢，这不是逼老百姓造反吗？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这个牵涉面很大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在七姑一带的高山峻岭上建起三层的石擂，把那最险要地方的悬崖小路掘掉了，并把交溪的“丁步桥”基挖了几块，这么一来，敌人的行动艰难了。五月底的一天，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进攻，我们立即投入战斗：七姑岭上割断藤条，石擂的石头打得敌人狼狈而逃；交溪的一路敌人，踏上我们挖了石基的丁步。立即象“猫碓米”一样滚入深潭的有不少人；洪口的一路敌人也被我们打得伤亡很多。

六月上旬，我们又集中力量攻打消灭了上洪、下洪的民团。这里是我们从柘荣到泰顺苏区的要道，但被民团堵住了，很不利革命，我们就集中泰顺县游击队100多人，趁反动团总都在上洪开会的时机，一下攻进上洪抓来30多个反动头子，此后，下洪的民团也建不起来了。

（五）秋收抗租斗争

通过上述反“围剿”斗争，敌人撤退了，形势好转了，我们就转入领导秋收抗租斗争，因为这时秋收已经到了。

我们寿泰游击队和江西红七军团配合起来斗争。集中时，红军休整，游击队担任警戒。一遇敌情，红军在前杀敌，游击队在后支援，分散时，各自按照共同研究好的路线，分散镇压根据地内的反动派，以保证秋收抗租斗争的胜利。

在九月的一个月里，我们镇压了85个反动派，纯洁了根据地；十月，即转入截口拦租的斗争，逢岭逢岔都有我们的队伍在埋伏着，等待没收租谷。那时，三滩和黄竹丛村有些农民，他们害怕百丈口地主的势力，偷偷地给地主送去九十多担租谷和一头牛，被我们发现没收了。谷交给可靠的群众晒存当“红军谷”，牛杀了吃，牛皮卖了买草鞋穿。第二次，我们在洪口没收了七十担租谷，全部分给仙居村的少数民族。从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中留下了革命种子。开展革命工作。

这种抗租的方法很有效，没有群众敢给地主送租了。弄得地主吃不上饭了。于是，泰顺各地地主又到温州、杭州去请来几百名伪兵来抢租，第一次从交洋谷坪，被一下子抢去200多担谷，连湿淋淋的田头谷也被抢走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召开工作团会议，采用两个措施：第一是发动群众存粮。在深山密林挖洞做窑，存好粮食，而后在险要地方倒上几斤谷子，再挑着空袋向地主哭诉说租谷都被“土匪”没收去了，无法交租，这一来，地主就无租可抢了。第二是截击敌人，斩断地主曾以抢粮的爪牙。象可溪一战，我们和红七军团的红军配合在一起，我们以一排兵力在山头上吸引住敌人，而主力由刘英同志带领，神速地驾木筏偷渡可溪。从

山脚下包抄过去，只打了一排枪，白匪全部跪了下来。这一战，缴步枪120余支和驳壳枪3支，大大打击了敌人，保卫了秋收斗争。

（六）艰难的一年

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三月①，形势又开始紧张了。敌人不知调了多少兵，在泰顺的外面包围了一个大圆圈，驻一村，编一村保甲，这圆圈逐渐向我们根据地压缩来。但是，对这种形势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照样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抗租抗债打土豪，可是只有一点我们感到不妙：那就是失去了和闽东党的联系，叶飞同志没有来信，信也接不到。四月②以后，才碰到一个交通，他的信因敌人追赶在半路毁掉了，只说，叶飞同志先后共派了十个交通，六个被杀于排头，二个被杀于岭北，形势紧张，为了明确下步斗争任务，我一连派了七个交通去找闽东党，也被杀四个，交通断绝了，怎么办？

这时，红七军团的电台收听到党中央发出抗日的号召，并准备突围。我准备召开工作团会议来贯彻，不料好几个工作团的同志均被敌人逮捕了。

到八月③，敌人包围圈愈缩愈小了，组织间兵，筑炮台、烧山，群众被束缚住了。我们不但难以开展工作，连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这时，七军团决定突围北上，叫五团来信限3日要我动身会齐突围北上。我回信要等待闽东首长叶飞、范式人同志的指示后再决定。3天后，刘英同志又来信叫我最后考虑。我回信再维持一个月决定。至此，七军团从泰顺突围，至柘荣打一仗后，即转道北上了。泰顺根据地群众见了说：“红军北上了，不给我们留枪，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解释说：“不要紧，国民党的枪都是我们的么！”

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几人坚持到一九三七年四月④，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们最后的根据地在七姑、半路也被敌人建立炮台，编起间、甲来了，我们只好决定暂时放弃这块地区，返回寿宁岗垄去找范式人同志，对于范式人同志已撤出岗垄苏区向宁罗古挺进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还以为范式人仍在岗垄。

六月初旬，我带了警卫员廖阿土的弟和工作团的×步镜，徐时库来到香姑岭的山脚下，渡河回岗垄的石竹舟。不料廖阿土的弟叛变，打昏了我，把我扔进河里，两个工作团的同志也被捕去，以后牺牲于寿宁南阳。我在革命群众的抢救下，终于死里逃生，但自此失去了党的联系。直到解放。

中共福安地委党史资料办公室整理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编者按：这篇回忆录对编写泰顺党史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中有些地名、错别字、句，我们作了更正。根据浙闽边当时形势有关资料考证，其中②有下列商榷之处：

①1936年3月应改为12月；②4月应改为37年4月；③到八月三字应删去；④1937年4月应改为五月。

山洞中的红军医院

黄明星口述

王简军整理

在泰（顺）分（分水关）公路的彭溪车站西北方向，有个方圆不到半里路的小山坳。山坳的东西两面各有一条山洞，洞旁有三座小茅屋，这就是我的家乡——双溪口村。顺着小洞向西走，大约三、四里路光景，便出现奇形怪状的山峰峭壁和一片茂密苍翠的森林，在逶迤二十多里路的山峰峭壁的腰间和底下，有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天然山洞。四十多年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这些草木丛生，又潮又湿的山洞，曾是当年中国红军挺进师的一个坚固的后方医院。许多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曾为这个红军医院的生存，作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至今我还常常回忆起医院的往事。

医院的创建

一九三五年挺进师进入浙南后，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创造了浙南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所向披靡。他们一连打了十多次胜仗。但是，每次战斗之后都有一部份伤员，仅进入丁、平、泰三县一带的几次作战就留下八十多位伤员，刘英和粟裕同志指示要依靠太平区这个根据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将伤员分散进行医治。一九三七年二月初，敌人调集了比我军多几十倍的优势兵力，向我挺进师指挥机关所在地——泰平区发起全面进攻。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存有生力量，挺进师决定暂时撤离这一地区，动用游击战术逐个地歼灭敌人。但是摆在部队眼前的有一个困难：这八十多位伤员中除了经过医治已有好转的五十多名可以返回部队参加作战外，尚有三十多名重伤病员如何处置？经过研究挺进师领导认为双溪口一带有较好的地形，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并在前段有医治伤病员的经验，决定以溪口一带山洞为依托，建立一个可靠的红军后方医院。同时为了保卫太平区根据地和伤病员，师领导还将当时担任瑞平泰中心县委共青团书记陈辉同志留在泰平区坚持斗争。

当部队撤离前的一天早晨，挺进师政委刘英同志紧急地把我召到师部所在地（当时我是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英同志随即接见我，并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阿三同志，你来得好，辛苦了。我找你来就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同你商量。你们村西有许多山洞，是吗？”“是的”我点点头。

“那好，当前情况你知道了，我军很快就要撤离这个地区。为了使部队能迅速转移，粉碎敌人围剿，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你们村的党支部和广大群众在数次残酷斗争中都经历了考验，而且你们还有多次组织医治伤员的经验，因此决定在你村西山的石洞中建立一所后方医院，把三十多位重伤病员留在这里养伤治疗。有什么困难吗？”

“有困难我们会克服的”我坚决地回答道：“保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很好”。刘英同志消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随后，他把左手轻轻搭在我的肩膀

上，和蔼而又郑重地问道。“阿三同志，敌人反动据点——彭溪村，距你村多少路呀？”

“十二里”。

“峰文村呢？”

“七里。”

“那就是说，医院是设在虎口边上了。因此你们必须要经常及时地掌握和研究敌情，紧紧地依靠群众。”

临走时，刘英同志交给我一百个银元，还有三把剪刀，一把钳子，几个小药瓶和一个破旧的药箱，他说：“这是医院的基金和全部医疗用具。今后有什么事情，可同陈辉同志联系，他留泰平区。我伤员中的周福生同志，他原来是某分队的政治委员，现在是医院伤病员的临时负责人。另外，我们把郑医师留下来帮助搞好医疗工作。”（郑医师是福丁人名字记不起来）

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我多谈，我当即告辞，刘英同志还亲自送我到门口。

回村后，当天下午，我就召开了支委会，传达和研究了刘英同志的指示。会后，几个支委分头带了一部份党员和积极份子上山，打扫了石厝洞、水边洞、内洞、谷公寨洞、内鹿洞、老虎洞、石西洞、坎脚洞等十七个山洞，用茅草烟熏走多年的雾气，并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茅草。

开始，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防止意外，便于治疗和紧急时转移隐蔽，支委决定先把伤员按伤势不同，分别集中在内鹿洞和水边洞，外洞三个洞，其他洞留着备用。当晚，全体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一起，乘着初春阵阵的寒风，踏着崎岖的小道，穿过稠密的荆丛，抬的抬，背的背，扶的扶把一个个分散在各村群众家中未愈的伤病员搬进了山洞。

这些伤病员中主要有周福生。余龙贵（现浙江省体委顾问）、朱中成、苏斗正、丁士文、王志芳、郭金锋等等，伤员们进山洞时的面色十分憔悴，有的伤口已经红肿化脓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仍是那样的饱满，情绪是那么乐观。伤势较轻的伤病员，一早，就忙着把医院布置起来，有的还在床铺边挂起了红旗，红星。他们边布置、边说笑，艰苦的生活和伤口的剧痛，丝毫挫折不了他们的顽强意志。

就在部队离开的当天早晨，我们双溪口党支部的几个支委和伤病员临时负责人在山洞中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后方医院建立起来了。但是，一场新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也开始了。

银元的故事

一个多月后，刘英同志临走时留下的一百元基金已经用光了，眼看三十多个伤员的吃饭，医治都成了问题。怎么办呢？我打算向群众发动一次捐献。我们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和党亲如骨肉，只要部队有困难，他们一定全力支援，那怕忍饥受饿他们也甘心的，我决定进山洞把这个想法请示医院负责人周福生同志。

周政委正在石头凳上看文件，他的右手受伤发炎，又粗又肿，身体发着高烧，但是他还在坚持工作。见我来了，他抬起头来对我说：

“阿三同志，医院的经费已经用光了吧！”

“是的，我想发动群众捐献，特地来问问你……”

“不能这样做，阿三同志！群众自从我们部队离开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迫害，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我们自己来解决。”说着，他从自己袋里掏出三块银元，交给我，并告诉我说：“同志们身边都有一点钱，有些是参军的时候带的，到部队以后，部队也有津贴，虽然数量少，也不固定，但大家都不肯轻易花掉，今天，大家知道医院困难，已经自动提出‘献银’了。我的意见，请郑医师和你一起到各伤病员中去筹集，你看怎样？”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人民的子弟兵，打仗杀敌，流血流汗为了我们群众，在困难的时候，又处处想到群众，遵照医院临时负责人的意见，我和郑医师一起马上到各个伤员住的山洞里去筹集资金。

不论我走到哪个山洞，那里的伤员们就热情地招呼。有存银的伤病员，不管自己有多少，都争先恐后地把银元拿出来，有的一、二元，有的二、三元，有的一、二角钱也献了出来。有些来自江西的红军同志，把银元缝在衣服里，跟着他们转战数千里，这一次也毅然地拆开衣缝把钱交给了我。一位躺在石西洞内的重病号，见我进来，毫不犹豫地用手“勒”地一声，拆开自己的衣缝取出一包东西交给我。我接过来，剥了二十多层纸，才发现一枚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位战士，激动地对我说：“阿三同志，这是我过去在地主家中当了十年长工积下来的唯一财产，虽然少，可是你一定得收下，如果没有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把我带入革命队伍，这块银元也早已不在了”。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们有这样的红军战士，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打倒，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这一次，我们共筹集了八十多元，经济困难可暂时解决了，当我正愉快地离开周政委的石厝洞时，在夜色朦胧中，传来了一阵尖厉的叫声：“口令，干什么的？”

我想，糟了，定是敌人发现了我。

我停下脚步一听，又是同样一阵喊声。哈哈，原来是敌人哨兵在那里直着喉咙空喊，壮壮自己胆子的。于是我就绕过岗哨，奔回家来。

一到家，妻子告诉我，伪保长来我家查过我了。迹象表明，敌人开始猖狂的大搜查。双溪口附近的大小山头上，到处布满了监视哨。

一把蕃薯干

果然，在三月中旬，敌人采取了“移民拼村”新的反动策略，限期强迫我们要全部移到峰文村的一个娘娘宫边去住，粮食也要全部带去，规定白天人员需要回村生产的要经过伪保长批准，扬言对抗者一律处死，妄图将我红军和伤病员困死。当时，情况十分严重，我多次要想同陈辉同志联系，一时又联系不上。后来，我们几个支委紧急碰头，共同研究对策。当时，大家意见认为既要斗争，又要斗智。表面上装作积极拥护拼村，暗中坚持地下活动，保护伤员。由于我们已经得知，当时参加移村搜查的反动武装，既有保安团，又有自卫队、联防队、乡保丁队，比较杂乱，而又互不信赖，互不了介，这

给我们少数人仍然留居原地创造条件。所以我决定先把我和二哥黄孔否、柯其葵母亲直接参加负责伤员工作的人留下来，其他人绝大部分表面上都移到峰文去，每天又组织他们以回村生产为名轮流返村，使敌人一时摸不清我们人员的底子，以掩护需要留村的人员。对于粮食也一样，把大部分粮食装在桶内转移山洞中去，一小部份挑到峰文去吃。伤病员的粮食一部份由我负责分散隐蔽，一部份由苏君忠负责隐蔽。以后敌人检查得更严了，伪保长亲自检查。我们又组织留村的人员轮流到峰文去，去时特地跟一些到平阳卖箬叶的群众一起走，走的路线故意经过峰文村伪乡长住处门口，给伪乡长看看是去平阳做生意了，而在半途又偷偷地折回村中继续搞护理伤病员的工作。由于我们采取了种种相应的措施，使我们党员、群众在敌人移民拼村阴谋面前，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而又使伤员的护理工作不致中断。

自从敌人实行移民拼村的反动策略后，双溪口一带几乎是百步一岗，处处设哨，把大大小小的山头 and 大小路口都封锁得死死的。这使医院的粮食和药品供应时常短缺，伤员也经常处在半饥半饿和缺医少药的困境中。

有一次，我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把一部分粮食送到山洞，看到伤员同志由于缺吃少医，脸色比以前更加消瘦饥黄了。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过，怎么也忍不住地流下泪来。尽管如此，我们的战士却没有一个愁眉苦脸的。我当即迫不及待地解开麻袋，把番茹干一把一把地送到他们手里，战士们笑着接过番茹干，象吃灵丹一样，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分好后，周福生同志把我找去。我向他汇报了村里敌人的情况，以及这几天不能及时送粮食的原因。周政委沉着地思索了好久，说：“阿三同志，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今后你们送粮可以由村里几个支委轮流担任；同时，在敌人的哨兵中间，可以设法做些争取工作，另外，老二情况熟悉，最好到山洞来帮助煮饭、煎药和护理工作。”因为想在天亮前赶回村去，周政委只简单地向我交待了几句就随即把我送出洞口。不想，东方的山尖上已露出了一线曙光。

白天行动是十分危险的，但三十多位伤员的粮食等着我去筹划。于是我决定冒险闯下山去。谁知当我在洞口向四周观察时发现在返回的路上有一线电光在来回巡视着。周政委立即抓住我的肩膀说：“阿三同志，为了整个医院的安全，等到晚上再走吧！”

这一次封锁一直连续了五天。在洞外的路上，敌人进行了特别戒严，我几次想出去，几次被周政委劝住，他每天晚间还亲自到洞口侦察敌人行动的规律。

到了第五天，也是全洞同志吃野草过生活的第二天，我急得不能等了，我说：“周政委，今天无论如何你要让我出去”。

“好呀！”他带着笑意回答说：“我已经找到电光的秘密了，今晚保证你安全回村！”

天一黑，周政委就把我找去，他说：“经过这三个晚上的侦察，敌人用电光巡视山路，大体上有一个规律，每次间隙有十至十五分钟，这就给我们有一个突围的机会。因此我同意你冲出去，这次去，要特别注意争取敌人中可以争取的人。另外，今晚你不能单独一个人出去，我决定派郑医师跟你去，以防万一。”说罢，他又转向正在煮药的郑医师说：“郑医师，你分完药后，立即与阿三同志一道出去，必要时你要全力使阿三同

志脱险。”

年青的郑医师微笑着，坚决地点头说：“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周政委也满意地笑了，他转向自己床头，摸出一把蕃茹干递给我说：“阿三同志，你也两天没有进食了，这一把蕃茹干是我舍不得吃而想留给重病号吃的，现在你与郑医师拿去充饥吧。你们有足够的精力冲出去，就能早日给伤员们带来希望。”

我双目注视着周政委递过来的一把蕃茹干，泪水立即顺颊而下，我怎么也提不起手来去接。许久许久，嘴里才逼出几个字来：“周政委，不能这样做，我一冲出去就可以找到饭吃的啊！”

“不，阿三同志，更重要的是现在，你不要难过，饥饿和病痛是磨灭不了革命战士的坚强意志的，我们将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周政委严肃地说，我知道他现在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全体。于是，当郑医师给伤病员服好药后，我毅然地把蕃茹干分了一半给他，在那些脸色饥黄的伤病员同志关切、期望的目光之下，象宣誓似地几口吞了下去。

我俩随即离开山洞，向靠近电光巡视的边缘地带的一个山坳中走去。为了以防万一，我俩决定采取先向南，再延东面靠近峰文，再闯回双溪口。因为我俩分析靠近峰文，敌人封锁可能会松一些。即使敌人发现，可装作是峰文过来，以保护山洞。

开始，敌人巡视的次数很密，间隙的时间也不长，但照了七八次后，敌人也就开始松弛下来。“走！”我轻轻拉着郑医师说，巡视电光一过，我们就迅速地越过山沟。一瞬间，第二次电光又可恶地从山洞那边扫过来了。随着电光的消逝，我俩猛力地冲出了敌人第一道封锁地带。当我们用同样办法冲出第二道封锁线时，由于是转了一大圈，所以已经到了半夜三点多了。连日来的饥饿疲劳一齐向我袭来，虚汗冒额而下。

拂晓，我俩终于绕过敌人层层封锁平安到达家中。当时，我妻子几次从峰文返村都碰不着我，怕我出事，晚上也冒险在双溪口住。她一见我回去连走路也没有力气样子，知道我俩是饿过度了，就马上要烧饭给我俩吃。但是，我们一想起山洞里红军战士挨饿的情景，也顾不得吃饭，立即请我妻子去通知召开紧急支委会，具体研究送粮的问题。

第二天下午，我根据支委会的意见去对敌人伪保丁队班长做争取工作。因为这个班长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也是个穷苦人出身。同时，他这个班刚好是负责到伤员山洞的这条通道，能争取过来对以后送粮送药也有很大的帮助。开始，我先把 he 请到家里坐，弄点烟、茶给他吃，边谈边拉，我妻子也故意当着他的面，把一只大公鸡杀掉，我知道他的嘴很馋，叫他留下吃晚饭，他满口答应。快吃饭时，我看见一个路过我家门口准备去换岗的哨兵，我也乘机去拉来一起吃饭，后来在那里站岗的哨兵不见人来换岗也自动下来，我一见也把他拉进来吃，四个人边谈边吃，我还同那个班长不断地启发回忆小时候的生活，大家谈得津津有味。就在这个时候，郑医师和我二哥黄孔否也乘机通往山洞，把粮食送进去。（从那时候起，我二哥就根据周政委的意见，一直同郑医师一起在山洞里替伤员煮饭、煎药、协助护理工作，成了山洞一个内当家）。同时，由于我不断对这个保丁班长做争取工作，曾有一段时间他对我们的行动也是开一眼，闭一眼，给我们送粮送药工作带来方便，直到他调防。

千难万险脚下踩

为了粉碎敌人“移民拼村，层层设防”的阴谋，我们做统战工作是比较认真的，除争取了那个伪保丁队班长外，我们党支部还发动党员、群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去做伪保长、伪自卫队、保丁队人员工作，因为这些人大都是本乡本土，有的我们一见面就互相认识，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或加以“中立”，即使是一度也是有好处的。在党支部和一些党员、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我们一度把董家坪的伪保长苏君瑞，火把岭伪保长曾自准，峡后伪保队付施明法，争取过来或保持中立。而且，还通过关系做了峰文乡伪乡长林存谱的工作，向他讲明厉害，要他保持中立。在峰文、彭溪的伪自卫队中也建立了我们的内线。天门下村党员邱国洗还通过关系把当时伪黄浦军校毕业回乡的胡正藩也建立了关系，他表示保持中立（当时，对这个人，国民党泰顺县国民兵团付团长俞士雄也去拉，但没有拉去）。由于我们积极做统战工作，这不仅使我们能及时地较确切地得到敌人活动情报，保护伤病员的安全，而且对以后坚持斗争也起一定的作用。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还千方百计地发动党员群众献智、献力、献财、献物，克服各种困难、冲破敌人道道封锁，把后方医院坚持下去。

初夏，天气转热，伤病员吃水、用水量大大增加。伤口的炎症也逐渐扩大，医院和伤员迫切要求我们增加一些水。说我们每天送去的水只能煎药用，伤员没有水喝。

怎样才能供应三十多位伤员的吃水、用水，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粮食是干燥的，可以包起来埋在焦泥灰下面，上山施肥为借口，瞒过敌人，可是这么多水，怎样才能运上山呢？我们几个支委商量决定，把水放在瓦罐里，埋在焦泥灰下带上山去。

第二天，我送水进洞。郑医师一见就抓住我肩膀说：“阿三同志，水带来了没有？”“带来了”。我边答边把罐头从泥灰中取出。他一看，轻轻地说：“太少了，以后不能再增加一点？这几天，会动的伤员都靠早晨到洞口吃些草上的露水过日子，不会动的伤员只好含些湿泥来止渴。许多同志常常因为缺水而晕倒。”他说着，把罐头里的水小心地倒进煎药罐里，一点也不让它滴到外面。

听完郑医师的话，看到处在饥渴之中的三十多个战士，我的脚一刻也站不牢，立即心事重重地返回村来。一到家，我东转转，西靠靠，满脑子考虑的是“水”，妻子几次叫我，我都无心睬她，而她却耐心地问我道：“三佬”，究竟什么事呀？把你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有什么事可以说出来商量商量，一个人急有什么用！”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把山中缺水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谁知她倒真机灵，不多一会就替我出了好注意。她说：“这不容易吗？可以在送肥料的大粪桶中间加一层底，上层放肥料，下层放水，，不是可以多运水了吗？”

我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我就自己动手把一担平时没有什么使用的旧粪桶加以改装，将桶内壁和上下盖板刨得干干净净，为了不致上层粪便流入下层的桶内，又把上层盖板所有接缝处用油泥加以密封，但倒水，装水无法进行，我又采用了在上层密封盖下沿的桶壁挖一个小孔，装水时用一根小竹竿插入小孔，通过小竹竿的内管把水装进

去，水装完后用一块小木头把小孔塞起来，使敌人检查时，不容易发现。这样一次送水就可以达到大半担，终于解决了伤员用水问题，又突破了一道难关。

在敌人封锁后，医治伤员的药品采购发生了困难。我们就发动党员群众就地取材去拔草药，还通过一些商人关系到彭溪等地去搞一些急需的中西药。我们搞草药是根据当地土医的单方。听说土黄连、土黄柏捣碎后糊疮口可治枪伤毒，土黄芪叶可治皮毒，根可作滋补，就发动党员群众每天偷偷上山，以拔草为名，把草药一篮一篮地挖回来，加工给伤员治疗。以后时间一长，邻近这些土药几乎挖得光光了。我们又通过民间医师取得了烂蕃茄叶加蛋清捣烂，金瓜瓢（南瓜）加蛋清捣烂糊在伤口也都可以治枪伤毒的单方，又发动群众寻找烂蕃茄叶和金瓜瓢来加工土药。以后，我们又取得一个单方，讲山上的一种小青蛙加蛋清捣烂治枪伤很有效，又发动群众上山抓小青蛙给伤员加工草药。我们就是这样解决了药源。这些草药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在困难的环境下把大多数伤员的病医治好或控制住病态的发展。当时，为了促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我们还克服种种困难四处求医。先后请了横坑的中草药医师许宗枢，福丁面洋地方中草药医师翁再糯，李金水，福丁东云村的一个中草药医师林医师（名字记不起来），这些医师也都曾冒着生命的危险先后前来双溪口山洞，给伤病员医治。

在敌人封锁后，有时分散隐蔽的伤员，一时粮食、药品我们供应不上，一些党员、群众就主动挑起护理伤员的重任。象天门下山洞的一个伤员，内寮自然村畲族群众雷孔拿就主动白天上山采药、送饭，夜里给伤员放哨达半年之久；西山大坑内洞一个姓洪的伤员嘴边给敌人枪打伤，伤势很重，连饮食也不能自理，西山村的群众卢立城母，吴尔发母两人就冒险将伤员转到家中，两家轮流保护，并细心加以调服，每天三餐把稀饭一口一口喂给伤员吃，直至伤势好转后，才送到洞内继续隐蔽治疗；董家坪党员苏君救，当有一次住在内鹿洞的伤员粮食供应中断了，而他家又没有粮食，全家完全靠野菜充饥。但为了供伤员能吃上饭，毅然上山把刚刚长有一点点红根的一千多藤蕃茄先后挖出来，煮给伤员吃。挖掘刚有一点红根的蕃茄犹如杀鸡取蛋一样，对于山区依靠蕃茄作为主食的群众来说，确是一件冒来年断炊风险之事；青皮坳妇救会员吴细媚，在得知青皮坳山洞内的一个伤员身体发高烧，体质很弱，经常昏迷，极需增加补品服用，而当时又弄不到补品、她当即不顾自己奶少，小孩子还不够吃，把鲜奶挤下，用碗端给伤员吃，长达一个多月，直至伤员病势有所好转。

在敌人封锁后，一旦发现伤员住的山洞有暴露的迹象时，我们就及时组织转移、以保护伤员的安全。如有一天晚上，在董家坪山上有一个小茅屋，当时坚持太平区斗争的几个同志临时住在那里，晚上点灯时不小心将茅草屋烧起来，那里距峰文村又近，峰文敌人发现火光和烟雾后，就用机枪扫射加以试探，而我们的一个同志又沉不着气回打了一枪，暴露了目标。当时这个地点又距我们住有伤员的内鹿洞很近，我们一知道这一情况，就召开紧急会议，连夜发动双溪口，峡（隔）后，青皮坳，董家坪的党员、赤卫队前往内鹿洞把伤员向长潭洞转移。从内鹿洞到长潭洞将有十五里路，而且必须在天亮之前要转移好，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党员、赤卫队不顾个人的安危，背的背，抬的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踏着雨后泥泞的山路，将伤员全部转移到长潭洞。特别是长潭洞位于大溪长潭边上，进洞必须先过溪，当时大溪雨后又有大水，不少同志失足落水，

爬起来不顾自己全身湿透，困难地将伤员一个个抬进洞去。第二天天一亮，敌人果然出动了大批队伍，向董家坪山上一带进行了大搜查，幸而我们已全部转移了。如果我们当时稍慢一步，这十多个伤员就会全部落入敌人虎口。象这样的情景何止一次呢？

不朽的战士陈成俊

六月中旬，敌人又突然加强了对双溪口一带的封锁，医院的供给又几乎断了，伤员再度过着缺粮、缺水、缺药的艰难生活。山洞中的伤员出现了叛徒，而就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一名红军战士伤员陈成俊（双溪口当地人，他一边在山洞养伤，一边帮助护理伤员），他为了保护战友突围而英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事情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次，战士们连续四、五天吃不到一颗粮食，周政委不顾右手伤口红肿发炎，亲自带了几个能走动的伤病员去采集野草，谁知拔来的野草味道很苦，大家都吃不下去，周政委立即自己盛上一碗，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在患病时，药再苦也吃得下，创口再痛我们也能熬过去，打仗的时候，火力再猛的封锁线我们也要冲过去。现在魔鬼纠缠着我们生命的时候，难道连这一点带苦的东西都吃不下去吗？”他说完立即自己带头喝下去。

同志们坚决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野草汤。

“周政委说得对，我们现在吃苦草，也是为了打败敌人呀！”伤员小徐说。

“等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人丰衣足食，那时候你想吃苦草也吃不到了。”伤员陈成俊笑着说。

“哈哈！吃苦草，说甜话，草也不苦了。”战士们一下子乐开了。

这时候有一个叫庄定效的伤员，却拉长着脸在一旁沉默不响。

他病势最轻，是全身生疥疮的，但整天总是愁眉苦脸的。最近几天他疥疮已经治愈了，经常一个人出去吮露水吃。有一天下午，他借口出洞找水，突然失踪了。

这一突然发生的事件，立即引起了周政委的警惕。他立即通知洞内外的伤员作好准备，待月亮上山时，出洞转移。

这时，叛徒庄定效逃到峰文投敌后，立即就带保安团到双溪口来抓伤员，在路过车路田自然村时，刚好碰着曾庆垂妻拔草药回家，她的篮子下面放养兔的青草，因为她曾给伤员送过饭，被叛徒认着，问她从哪里来，她说拔兔草。问她认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要搜查篮子，她就大胆把篮子给他。叛徒不识草药，看看都是草，也搜不出什么，后又要她讲出车路田藏伤员的山洞在那里，她说不知道。就在叛徒追问山洞红军伤员情况时，被隔壁的共产党员曾庆海听见。庆海就立即从后门跑出去报信，怕时间来不及，就一边跑，一边叫：“国民党来抓伤兵了，赶快跑呀！”敌人一听有人报信，立即放弃了对庆垂妻的追问，向内外洞伤员所在的山洞方向追去。